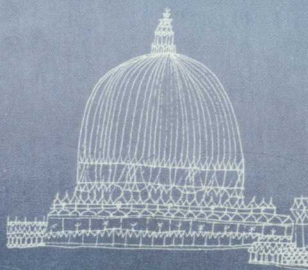


孔子讲学“杏坛”，弟子称颂，谓夫子之教
“如时雨之化”，可见在孔子的时代，杏花与春雨，
已具有美丽的象征，启人无限的联想。



第一次寒流

诗中的杏花雨，当然指的是春天下的细雨，落在杏花上，也落在人的发际衣襟，然而从宽解释，杏花雨也可指杏花落时花落如雨的姿态。有一个春天，我曾独自面对一树繁华璀璨的白色杏花，达一周之久，也都是春雨轻绵的日子。一天，

● 周志文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
周志文 主编

● 周志文 著

第一次寒流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次寒流/周志文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周志文主编)

ISBN 978-7-208-07819-2

I. 第…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766 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王小阳



第一次寒流

周志文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62,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819-2/I·548
定 价 29.00 元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周志文

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丽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

闹，其实涔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藉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

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二〇〇八年戊子春日 周志文谨序于台北市诏安街永昌里

序二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

胡正之

分工日趋细密的今日，人很容易被职业定型，讲究专业之下，古代淹通博知的“通儒”，或中古西方兼擅不同领域的“文艺复兴人”，都极难见诸今日。“专精”当然没什么不好，对社会来说，每一份子的专精，就是整体进步的基础；但单就一个“人”来说，心力、知识太过集中在一个地方，往往会让眼光随之狭隘，心灵日渐局蔽，造成与他人、社会，乃至天地的隔阂。

周志文当然有工作上的专业，但却不易以某个职称范围之，他任教上庠多年，无疑是个学人；又常在报端媒体发表作品，小说、评论、散文等结集成书者各有数种，当然也拥有文人的资格；对音乐、绘画也有甚深见解，极早就为报纸写艺评。但周志文作为一个学者，却不在乎各种奖助的业绩，不立山头，不争地盘；身为作家，他鲜少谈论自己的作品，更别说“打书”了，文稿一经出版，便完全放手，让作品与读者自行接触，绝不饶舌介绍。这些行为，都与当下一般的学者、作家不同。所以要定立他的身份，倒不如用传统的“士”来说明。今天习惯用“知识分子”来格义传统“士”这个观念，但两者毕竟是不太相同的，除了深厚的知识外，传统的士人，总得能写一笔好字，对音乐艺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文学上要有拿得出来的表现。才艺学识外，更为重要的是

“士”必须是一个有理想与原则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尚志”。然而有理想，免不了怒如疚如地忧时怀民；坚持原则，免不了磕头碰脑地遇到许多挫折；高尚其志的结果，当然是满肚子不合时宜……这些现象，周志文大概都有。

“忧时”大概是中国士人最常见的情感了，他们对世间有无比的热情，以国家的休戚、百姓的苦乐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安危治乱上。他们目光敏锐，看到许多危乱的病根与潜伏的祸患，免不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手上又没有权力势位可以解患矫弊；纵使揽辔登车想要澄清天下，但易退难进的性格，使他们不能也不愿参与权力斗争，而有权力的人也未必想听，或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所以只能将这些忧患转为文字著述，期待有一天能被注意。从作《易》者的忧患，到黄宗羲处明夷之时而“待访”于将来，莫不是这个道理。周志文文如其人，冲澹恬静，从不用贾谊“天下大事可堪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那样耸动的言词，但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时事世情的忧虑。

但忧时向来不能发挥什么实质上的作用，滔滔天下，不能家喻户晓，即使焦唇弊舌，依然是没多少人理睬的。如此一来，焉能不寂寞？周志文的散文，从笔调到内容，几乎时时可以感受到寂寞，这种寂寞，大多来自周志文的不与俗同，倒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品味太过精致高华，饮茶、音乐、思考，莫不如是。认真品味，原本是文化提升的必然现象，但在一个粗糙的时代，讲究品味是违俗逆时的事儿，我们习惯将价值信托给价格，把美感交付给流行，至于是非善恶，则选择一个群体投靠，一如投身庄园的中古农民，放弃身为人的自由，以换取心理上的安全感。习惯 KTV 的耳朵，怎能分辨演奏家指下的表情？嗜好声光影

像的眼睛，如何判断画中简单的线条？政商广告过度刺激后的情绪，焉得察觉幽微细腻的情思？流行以外的精致，我们既没能力，更没兴趣。在举世齐唱下里巴人的时代，周志文仍旧不愿随俗地讲些大家听不懂的话，所以他的书从未登过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意见，从未被多数人接受，大部分人甚至根本不在乎他说了什么，其孤寂自是难免。

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世莫我知的寂寞，当然不自周志文开始，而是每一个时代的常态。《论语》中最能见圣门气象的“浴沂风雩”章，肇自孔子对着子路、曾皙等学生的一段问答，原文是这样的：“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移为白话，大概是“别认为我年纪稍长于你们（而不敢放怀直言），你们平日常说‘没人了解我’，假如有人了解你，愿意用你，你们将有什么作为呢？”这里面“居则曰：‘不吾知也！’”很传神地描摹出了孔门弟子世莫我知的不甘。子路等人虽然不为世用，但并不寂寞；虽然心有不甘，但不至于悲怆，因为上面有孔子这样的老师，身边又有志同道合的友朋；然而后来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最为典型的是屈原，整本《屈赋》，几乎无处不在呐喊时乖俗逆，不为人理解的痛苦。

因此，“求知音”便成了千古以来知识分子的共调，伯牙绝琴于子期的故事，被一遍遍地引用；但知音难逢，岂是努力寻求即可获得的？所以寂寥之士只能将目标放在渺不可知的其他空间，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或寄托于遥不可及的未来，如司马迁的“以俟后圣君子”。这些寻觅知音的背后，正藏着无数寂寞的心灵。

照理来说，伴随世莫我知，知音难求的悲凉，自然极容易兴起另一种文学主题：怀乡。怀乡在传统的诗词歌赋中数不胜数。所谓的怀乡，

自然是生长环境的家乡，但中国的怀乡之作，却远不止这个层次。怀乡，是因为人在异乡；而“异乡”，并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意义，更是心灵上的存在感受。所谓的“异乡人”，表面上固然是指独居客地的人，但更多时候，“异乡”是由主观心态上形成的。无论身处故里或是异地，只要周围没有知音、没有了解我的人，那么这个环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一个理念不能被了解、感情没有交集，甚至连语言都无法沟通的异乡。

既然是怀乡，免不了会在故乡与异乡间作些对比，通常将心目中的故乡写得祥和美好，而异乡则是幽冷阴黯，像王粲登楼所见的异乡荆州便是“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以景写情，对照出身在异乡的寂寞愁苦。周志文当然有心灵的故乡，笔下那些伟大的音乐艺术，以及精彩的人物事迹，无不展现作者故乡的生气勃然与丰盛多姿。但有趣的是，周志文作品中很少有“异乡”之感。即使在更为异乡的异乡布拉格，似乎也没见到周志文有什么异乡人的感觉。在布拉格的一年，不是没有沮丧，但主要的基调，却是徜徉在布拉格璀璨耀眼的建筑音乐人文历史之中，大有“此间乐，不思蜀矣”之感。所以，虽然周志文的散文时时有着寂寞，时时有着对故乡的向往，却看不到他对异乡——现实环境的愤懑与怨怒。

周志文对存在环境的感受，呈现了逐渐平和的趋势，《三个贝多芬》（1995）中，还不时可以看到周志文对时局、文化的不满，以后，就很难看到这类谴责性的口吻了。这不是说此后的文章开始“未央歌”化，周志文依然直视人性的幽暗面，但对社会与个人的种种不善，不再诟斥责难，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同情，乃至由衷心忏悔，甚至连造成大灾

难的纳粹、文化大革命，都以向内的反省戒惕取代了向外的指责。

有了美好的心灵故乡，仍能对现实环境不疏离，不怨怼，随遇而安，这是相当难能的。周志文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他特别能欣赏或同情他人，不管是烜赫一时的大人物或是微不足道的小老百姓。他的同情，不是站在优势地位的滥施怜悯，而是“彼亦人子也”，那种以同为“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同其情。这种视角之下，无论是卑微鄙琐的小人物、巨奸大猾的坏蛋，都有身为人的那一面，既有人的脆弱，也有人的善良。因为这种同情，所以使得周志文特别能看到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人物。

钱宾四先生说我国历史，特别看重一些“无表现之人”。所谓“无表现之人”，是指那个人并未在所处当下的政治、社会有所作为，像是夷齐、颜渊，对殷周鼎革，春秋兴坏，绝无贡献，甚至关联性都极少，如果以记录历史大事为标准，原本是没资格进入史书的。但司马迁却将他们写入了《史记》。此例一开，以后的二十五史，也都为这些“无表现之人”另辟汇传。为什么史家特别重视这些人呢？原因无他，因为社会的治乱、百姓的苦乐，并不是只靠政治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最多只能满足人类动物性的存活（而此一存活，又蕴涵了更多的不安定），而这些无表现的人，反而能指出向上的路，说明我们除了动物性存活外的更高可能。

周志文的散文，也爱写“无表现之人”，像是平常我们不会注意的小人物，在庞大的交响乐团中，将注意力放在伴奏位置的长笛手（《长笛》）；在舞台上，将目光转向巨星背后的伴舞者（《配角》）；在社会上，不讨论政商名流，而写小巷里的算命师、公园中的老人、地下道的小

贩、出租车司机，甚至对草木鸟兽，也撇开松柏竹菊等传统诗词的千年主角，或潮流当红的玫瑰、兰花，而写一些随处可见的相思树、野姜花，乃至过猫、马齿苋等野菜。即使写到了富贵的牡丹、营销全球的郁金香，也一定要黜落人工精心培育后的国色，别有寓意地强调土生野长的美。倒不是因为受“五四”影响，带着知识分子赎罪的心态去写小人物，而是真从小人物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像是在理发妇人身上可以看到天使（《皮匠与理发师》），从乞讨者的姿势看到了赎罪（《布施》）。

《配角》中说：“我愈来愈注意在主轴之外可能发生的故事，在其间，原本是配角的人常常扮演主角的角色。”这与年鉴学派的想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不应该将焦点放在英雄人物身上，而该注意长时间的一些东西，像是社会制度与时代心态，乃至气候地理，因为真正决定历史事件的，正是这自然环境、制度文化与庶民思想。周志文当然不是年鉴学派，但他笔下这些无表现的人所展现或美或丑，或同或异，种种平平凡庸的表现，反而是许多历史事件的源头。

但周志文也不是全然悲观，另一篇《警语》，记载了与光头党的邂逅。光头党源自德国，可算是纳粹种族意识的余裔，因为经济因素或某些情绪，总以仇视或攻击外国人来宣泄无名的愤怒。在布拉格时，朋友警告他小心当地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结果周志文遇到的光头党，却是晒着太阳，拿香蕉逗小孩玩儿，周志文的结论是：“一个在和暖的太阳底下吃甜甜的香蕉的人，一个爱逗小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至于对其他族类做出什么仇恨或暴力的动作吧！”周志文笔下的一般人，虽然有愚昧、冷漠等各种缺点，但只要一点美的感召，人性中温情善良的一面，依旧会出现的。

王尔德说：“在惠斯特勒的画出现前，伦敦没有雾。”天地万物，虽然有着物理性的存在，但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到，必须透过某些观念，才能看到种种现象，了解它们的意义。换句话说，得要先有那些心思敏锐的聪明人，为我们架构出一个观念，我们才能看到某些价值。《易·乾·文言》说“圣人作而万物睹”，就是这个道理。文学的功用之一，正是让我们多看到一些东西。读周志文的散文，就经常可以获得这方面的惊喜。也正因这种敏锐的同情心，使得周志文对逝去的过往，有着特殊的掌握。

周志文的散文，经常有种沧桑感。东海变为桑田当然是可能的，只要给地球足够的时间；但生活在都市，却根本用不着地理时间，只要数年工夫，人文景观便能给我们足够的沧桑之感，这便经常成为周志文书中的底色，比如学校的图书馆、巷口的海产店，无不在写生活周遭的沧桑。这种今昔的比勘，呈现出来的不止是景观的变化，更多的是某种东西的失落。周志文对一些美好事物的消逝，是极为敏感与重视的，但沧桑本是世间常态，变化更是时光推移的必然，《新天堂乐园》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任谁也没有办法挽回。附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东西，也一个个地被带走，终于一个也不剩。对于这件事，只有如安东尼奥尼说的：‘我们只有调整自己去适应它。’面对变异世界的一切事，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但周志文的散文似乎并不甘心只是被动地适应，反而努力地“记录”，想要透过翰墨，替已然逝去的东西留下泥爪，让后死者与于斯文。

人世的一切美丑善恶，文化的各种意义，都必须依附事实方能显现，而事实则有待被人意识之后才算存在，而意识则靠我们的记忆保

存。如果记忆消失，历史不复记载，那么对人而言，事实等于从未存在，意义也就跟着丧失；意义的丧失即是文化的死亡。对此，周志文显然是极端关切的。“记忆有点像漫漶的石碑，上面龙飞凤舞的字迹都慢慢不见了，到后来，石碑的模样也整个变了，只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横放在地上，让人家当垫脚用。”对记忆与历史，周志文是充满焦虑的，反映在散文中，便是好写过往，经常是当下有所见闻，便拏着过往的经验知识相互比勘，从而产生各种情思感触。

稍有年纪的人，大概都喜欢追忆过往，何况是有着三千年记忆的周志文。但他记录过往，不是好汉吹嘘当年之勇，也不是白头宫女指点昔日繁华，更不是《洛阳伽蓝记》的铜驼荆棘；周志文笔下所有过往的起点与终点，是在当下。

人不能失去记忆，但记得就一定好吗？有道是：“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有些东西，忘却了反而好，时过境迁后，倒也了无挂碍；但周志文记得，所以饱尝了几十年的折磨。所以他说：“还好人的记忆有限，一些伤痛的事，过一段时间就会忘了，深藏在内心的事，久不提，也就淡了、忘了，最后终于消失……再严重的悲伤，包括国恨家仇，在时间的淘洗下都会消失无踪的。”（《像风一样》）我们之所以痛苦，除了生物性的压力外，很重要的另一来源，便是记忆，减少一些记忆，就减轻一些负担，日子将过得更逍遥自在。证据在另一篇《蒲公英的族裔》：吉普赛人因为没有记录，没有历史，所以无法团结振作，千百年来受尽欺压；但也正因没有历史，不记录苦难，使得吉普赛人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天都能快乐而轻盈地过着日子。

人毕竟不能真的没有记忆，我们靠着记忆才能定位当下，解释现

象，建构未来，了解存在的价值。但记忆却又是不太可靠的，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与心理因素模糊、消失、纠缠、偏颇；至于集体的记忆，也就是历史，未必比脑神经的传导与储存可靠，更可能因为时空的转变、情感的作用与人为的操作，而遗忘、误植，乃至扭曲。记忆与历史决定我们的存在感受，因此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但人又善于选择性地记忆与遗忘，有意无意地扭曲过往。如果所记得的都是丑陋、痛苦与仇恨，那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

借用章学诚的书名《文史通义》，不但六经皆史，文士翰墨、词人篇什，莫非史录。前人说“《诗》亡而《春秋》作”，在拥有历史发言权者陷入意识形态或零碎化的今天，周志文以散文点出这个时代我们所忽略的一面，其用心，或可说是“《春秋》亡而《诗》作”了。

（注：序作者系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 7 |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11 | 序二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胡正之

第一辑 生活

- 2 | 捕狗人
5 | 相思树
7 | 祭品
10 | 广告
13 | 票亭
16 | 市声
19 | 没有发生任何事
22 | 咖啡厅内
25 | 名字
29 | 配角
32 | 挥霍
35 | 邻居搬家了
37 | 木棉
40 | 落木
43 | 命运
47 | 棕榈
50 | 故乡的野菜
53 | 文图忆往